



從「成長」到「發展」 -營造有感的幸福社區

黃源協、莊俐昕

壹、前言

馬總統於今年(民國 101 年)2 月初宣布,自明年起將年年公布「國民幸福指數」,這項政策或許意味著政府與國人已經漸漸意識到一味的追求經濟成長,將出現許多後遺症。亦即,除了國民所得和經濟成長率之外,國民的幸福與否才是一個負有責任感之前瞻且現代化政府所應重視的。當世界各國競逐經濟成長時,雖造就出亮麗的國民所得的提升,但卻也衍生出許多負面的結果,例如,環境的污染與破壞,高度競爭帶給人民的焦慮、壓力與不快樂。顯然,國民所得高並不代表幸福快樂的程度一定隨之提升。

天下雜誌在 484 期以「不丹窮而快樂 vs. 瑞士富而幸福」封面主題,深入報導「這兩個和臺灣差不多的內陸小國,身旁都有超級經濟體的強大磁吸。如何在市場經濟、福利國家的左右兩端,走出不同於大國的幸福之路?」。在「大政府的福利國不丹 - 快樂發展的王道」一文中指出,寧要傳統文化與環境保護,拒絕經濟快速成長,不丹發展出「國

民幸福指標」(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取代傳統 GDP 思考,正進行一場替代發展道路的實驗;但對外開放與經濟發展帶來的強大誘惑,不斷考驗不丹對追求「快樂」的堅持。在以追求人民的幸福快樂為最高指導原則下,不丹的 GNH 指標共分成心理健康、社區活力、文化、時間使用、政府管理、生態、生活標準、身體健康、教育等九大領域。

1965 年的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正式啟動臺灣以「社區」為名的相關計畫,歷經近半世紀的發展,臺灣的社區工作蓬勃發展,以社區為名的方案或計畫不斷出籠,如社區發展、社區營造、福利社區化、社區產業...,在政府、民間專業團體及社區的努力下,確實也營造出一些顯著的成果。然而,許多社區長久存在的問題,似乎並沒有因政策的推動而獲得舒緩,甚至加大社區之間的落差。此外,一些以產業著名的社區,雖為社區的經濟注入新的活水,但是否真的為社區居民帶來真正的「快樂」與「幸福」,不無疑問,不丹的幸福哲學或有可供我們社區永

續經營上的參考之處。

永續社區 (sustainable community) 是社區發展追求的目標，永續需要兼顧到經濟、社會、自然和人文之全面性的均衡，換言之，僅有經濟上的「成長」並不一定為社會帶來全面性的「發展」，如同不丹之「國民幸福」不應只是建立在經濟或財富的基礎上。本文將從「永續社區發展」與「社區生活品質」的觀點出發，在檢視臺灣社區發展的問題之後，提出如何將臺灣的社區從「成長」帶向「發展」的相關建議，以期讓我們能夠真正營造出一個符合永續發展且有感的幸福社區。

貳、「成長」與「發展」

「成長」(growth) 與「發展」(development) 往往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所關心的議題，兩個名詞亦往往被視為是同義詞，且傳統上也是國家和社會所企求的。然而，若將他們放在社區的脈絡裡，卻有愈來愈多的社區居民對「成長」與「發展」兩個概念抱持著審慎與敬畏的看法，甚至視之為負向的用詞，特別是那些假定成長和發展會為社區帶來更多的人與車、壅塞的住宅、自然環境的退化、以及人際關係的疏離等。基本上，「成長」與「發展」是有所區別的，「成長」意謂著特定現象之「量」的增加，例如，工作、人口和收入，它也可能被用於指涉「質」的變化，例如，較佳的工作或較安定的收入來源；「發展」則包括社區內之結構的改變，特別是資源如何被使用、制度的功能發揮、以及社區內的資源分配 (Green & Haines,

2008)。從其意涵觀之，「成長」與「發展」應是個正向，或至少是中性的概念，之所以有敬畏或負向的看法，可能是因為人們缺乏對「成長」與「發展」做理性的規劃。Green & Haine (2008) 即認為，社區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即是要降低生產技術和市場環境改變所造成的負向效應。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Amartya Sen 將「發展」定義為自由 (freedom)，依照他的觀點，經濟和社會高度的不平等即呈現出發展的障礙，因為窮人並沒有相同的機會去開展其能力。這或許意味著經濟和社會的「成長」並不必然帶來「發展」，因為他認為「發展」應該包括五種不同的自由型態 (Sen, 1999; 引自 Green & Haines, 2008:4)：

1. 政治的自由 (political freedoms)：主要係指公民的解放；
2. 經濟能力 (economic facilities)：係指家庭持以在市場上生產、消費和交換的資源；
3. 社會機會 (social opportunities)：係指改善生活品質條件的社會安排，例如，教育、健康照顧等；
4. 透明保證 (transparency guarantees)：係指人們彼此之間以及個人和其政府之間的信任程度；
5. 防護安全 (protective security)：係指提供一個社會安全網以讓受影響的個人免於掉入不幸的境遇，特別是飢餓或死亡。

Green & Haines (2008) 認為，儘管 Sen 的分析強調的是國家或全球的發展，許多這類的因素可被用於地方層次，然而，其主要的

要點在於認為「發展」不能夠被降到只是收入或工作的成長，而是它應該被視為是改善個人的機會和生活品質之更廣泛的過程。Rubin & Rubin (2008)也認為，發展包括能夠使得人們抵抗和掌控個人或集體資源的創造，發展出現於個人擁有可以成功的自信，以及能夠採取共同改善物質和社會生活所須的技巧和物質資源時。儘管，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的成長將自動改善生活品質，然而，Sen 則認為這種關係是更加複雜的。

基於前述的討論，Green & Haines (2008)認為，經濟也許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導致發展。例如，一個社區財富增加了，但若這種財富是由少數家庭所持有，這種改變將被視為是一種「成長」而非「發展」；同樣地，若一個社區能夠吸引一位可提供 100 個新工作機會的雇主，但 90 個工作機會卻由社區外的所占用，且這 90 位員工也不在地方購買財貨或服務，這也被視為是一種成長而非發展；又如一個森林社區吸引一家造紙工廠來該社區運用其資源（設廠），但卻抱持著一種非永續的態度，這也是一種「成長」而非「發展」，而且，若一個未來的經濟活動資源遭到摧毀，它再不可能會有其他的發展。

顯然，在社區的脈絡裡，成長可能僅是發展的機會（opportunity），它不必然會帶來足以讓人們覺得生活品質已獲改善的發展，特別是發展所涉及的層面與層次是相當廣泛的。因而，若一個社區具備更多有助於社區發展的資源，或許意味著這個社區有較佳的能力（社區能力）；但這些能力僅是一種機會，若未能善加運用或運用不當，其可能呈現的也僅是一種成長的現象，對於社區居民

生活品質的助益有限，甚至有負向的影響。Green & Haines (2008)即認為，發展可能導致較有效率地使用資源，降低社區對外部資源和決策的依賴，並能夠開創一個管理市場以滿足地方（社會）需求的較佳體系（財務、住宅、勞動等），這種過程的主要要素之一，即是對於地方層次之發展決定的配置，以經濟發展、環境和社會需求之間的關係是最為明顯的。就此而言，代表一個社區之成長的社區能力，與代表一個社區之發展的社區生活品質，兩者之間並不必然是正向關係，其間的關係可能隨著社區的環境脈絡之不同而有差異。因而，社區工作的目標必須要能同時兼顧「成長」與「發展」，始能讓社區的能力真正有助於社區生活品質的提升。

參、永續社區發展

一、「永續社區」的意涵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一趟旅程，若將它置於社區脈絡裡，並與「社區發展」結合，即形成「永續社區發展」（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Hamstead & Quinn, 2005），這趟旅程的目的地即是「永續社區」（sustainable community）（Peat, 2007）。「永續發展」出現於 1987 年的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報告（the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中，該委員會主席 Gro Harlem Brundtland 將「永續」（sustainability）界定為「在不危及未來世代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下，能夠滿足目前需求的發展」（WCED, 1987:43）。基本上，永續

發展相當強調經濟、環境（生態）和社會的均衡發展，在經歷過過度強調經濟發展對全球生態環境帶來大災難後，許多國家開始思考如何在強調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能避免對生態環境進一步造成傷害。

然而，在全球競爭的氛圍下，若欲完全犧牲經濟發展以成就生態環境，可能只是一種浮詞（*rhetoric*），若不顧生態環境而持續發展經濟，亦難以承受國際或社會輿論的壓力。在這兩難之間，有學者提出「弱永續」（*weak sustainability*）與「強永續」（*strong sustainability*）的區分；「弱永續」認為，無限的經濟擴張是不可欲也不可能，但卻認為維持成長應該是經濟活動的主要目標，為此，該觀點提出一種「有限成長」（*constrained growth*）的論述，主張不可回收性的資源可由其它能源和產品來取代，例如，資源的回收；該觀點認為，透過經濟和社會的獲取，只要天然和人造資源能夠維持全面性的均衡，某些環境的持續退化是可被允許的。然而，「強永續」卻強調保有、改善和維繫現存和未來資源的重要性，該觀點反對「弱永續」之「有限成長」的論述，強力主張較多的資源保護，特別是一些主要的天然資源，即使需要放棄某些發展的機會（Hamstead & Quinn, 2005; Gamble & Hoff, 2005）。

永續發展考量的是一種經濟、社會、自然和人文之全面性的均衡，「社區發展」重視的是社區生活品質的改善與提升，將「永續發展」與「社區發展」結合而成的「永續社區發展」，也即是一種將「永續發展」中的經濟、社會、人群及生態環境的發展，置於社區的脈絡中來實踐。何以「永續」與「社區」

或「地方」結合是一種較佳的發展模式呢？Green & Haines (2008:230)即提出三種理由說明之：（1）地方層次是人們與自然環境互動最多且最直接的地方；（2）在解決環境和社會問題時，地方行動和策略往往是最有效的；（3）個人在某一特定地方居住和生活，可能會因他們如何消費和消費什麼之改變而受到影響。這些說明意味著社區或地方是人群、環境及經濟活動最基本及最直接的單位，永續發展的實踐若脫離社區或地方，將是缺乏根基的。

「永續社區發展」的目標在於營造一個「永續社區」，「永續社區」可以三個面向（3Es）來強調其「永續」的本質：經濟（*economics*）、環境（*environment*）和平等（*equality*）或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因而，生態、經濟和社會福祉必然是相連結的；對「永續」而言，每個面向皆須均衡達成，任何一個部分若過強，即可能不利於另一面向的發展（Green & Haines, 2008; Hamstead & Quinn, 2005）。因此，為達到「永續社區」的理想，實務上應具備多方面的理念或技巧，如民主與參與、能力建構、社會資本、跨部門的互動及環境意識等（Gamble & Hoff, 2005）；這些理念或技巧也即是能否執行「永續社區發展」，以及能否締造「永續社區」的重要基礎。為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掌握「永續社區」所須具備的基礎，這些理念或技巧或可歸納為社區價值（含社會與環境正義）、社區能力及社會資本（含網絡、信任與規範等）。

二、「永續社區」的基礎

(一) 社區價值

「永續社區發展」必須有一些價值做為其活動的基礎，這些價值包括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參與 (participation)、公平 (equality)、學習 (learning)、合作 (co-operation) 與環境正義 (environmental justice) (Home Office, 2004:8-11)。永續社區發展必須是要全面性的，它需要關注的不僅是其結果，也要能夠著重過程中的能力培植。從過程面言，它需要藉助於社區充權 (community empowerment)，從結果面言，則在於獲致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及促進社區全面生活品質的提升。社區充權的目的在於藉由參與、學習和合作等以提升社區能力，因而，它也是一種社區能力建構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 社區能力

「永續社區」的建立和維繫，其前提必須是要社區本身具備相關的能力，否則，即便社區有可能因外在助力而促成社區發展，但其成果可能僅是曇花一現。社區能力可從三個面向來瞭解其內涵 - 內容、過程與目的。就內容而言，社區能力即是一個社區資產及其屬性的總和，包括有形的、人力的、社會的、財務的、環境的、政治的及文化的資產。就過程而言，社區能力即是社區中的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組織、以及組織與組織之間的互動，甚至是社區中的個人、團體及組織與社區外的可用資源產生連結，其用意在於為社區累積更多的資產或力量，以期有助於社區行動目的的達成。就目的而言，社區能力的即是為了解決社區集體問題或促進

社區生活品質。

(三) 社會資本

永續社區需要以「社區能力」為基礎，社區能力中的人力資本與組織資源往往是有形的，社會資本則是無形的資產，有形資產易於讓社區的外觀顯得耀眼，但若缺乏無形的資產做為後盾，外觀的耀眼將可能是短暫且缺乏根基的。Bourdieu (1997:51)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彼此熟悉或認可的制度化關係之永久網絡的實質或潛在資源的總和」。依此定義，社會資本是由個人藉由參與團體及團體本身的關係所取得之利益所組成。Bourdieu 進一步指出，產生社會資本之社會網絡建立的最終目的，在於提升經濟資本；且任何個人所擁有之社會資本的多寡，部分是由其它形式的資本所決定（經濟、文化或符號）。Bourdieu 的詮釋除彰顯出社會資本與社會關係的關聯性外，也隱含著社會資本與經濟和文化資本之並存及互惠的效應。Bourdieu 這種將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本視為並存的現象，若將它置於社區的脈絡裡，也即在強調社區內之各種資本相互依存的重要性，這種提醒對全面性社區發展的實務有其重要意涵。

Kavanaugh, Reese, Carroll & Rosson (2005)即指出，具有高社會資本的社區可能比低社會資本的社區有較高的生活品質；Mel & Jenny (2007)的研究亦指出，當社區的發展面臨到威脅時，社會資本是建立連結、溝通和凝聚所必要的要素，它使得文化能夠再造，並提升環境保護以追求永續。Putnam (1993:1)認為，類似於有形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概念 -

提升個人生產力的工具和訓練，社會資本與社區組織的特性有關，例如，促進彼此福祉之協調和合作的網絡、規範和信任。Kay (2006) 即認為，這些構成社區內之社會資本的要素，對社區生活品質的改善和社區發展是必要的。

(四) 社區價值、社區能力、社會資本與永續社區發展

社區價值、社區能力與社會資本三者對永續社區發展是不可或缺的基礎，社區價值隱含著永續社區發展所必須具備的過程目標與結果目標；社會正義、公平與環境正義為永續社區發展所追求的理想，參與、學習與合作為實現永續社區發展的理想所須的實務策略。然而，一個社區若缺乏必要的資源或能力，徒有理想或策略，亦難以達成其目標，為此，社區中的人力、物力、組織資源與社會關係所形成的社區能力，實為達成社區永續發展之理想與策略不可或缺の後盾。社會資本為社區能力的一環，一個社區縱然擁有絕佳的有形資源，若社區的關係網絡是疏離或矛盾與衝突的，尤其當社區成員為爭取有限的有形資源所產生的爭奪戰，反而可能讓有形資源成為撕裂社區凝聚或社區意識的禍首。為此，社會資本實為各項社區能力的黏合劑，也是邁向社區永續發展的磐石。

肆、社區生活品質

促進或改善生活品質一向是每個個人、社區、國家，甚至是許多世界組織所共同追求的目標。然而，如何界定與測量「生活品

質」卻仍缺乏一致的共識。Seik (2000)將生活品質界定為「個人對整體生活的滿意度」；Bonaiuto et al. (2003)認為生活品質是「居住在某個特定地區所衍生的愉悅或滿足的經驗」；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將生活品質定義為「在文化與價值系統的社會脈絡中，個人對其生活所在位階之知覺；個人生活在這種文化與價值系統中，而此系統與人們的目標、期望、標準及關懷有關」(WHO, 1999)。Aki et al. (2008)認為，生活品質包括生活滿意度、社會功能、日常生活活動、以及身體的健康。李永展、吳孟芳(1995)認為，生活品質係指人民對其所處生活環境的滿意度。陳宜音(2002)認為，生活品質是一個人對於其生活狀況所做的整體評估，而生活品質評估又可分為客觀指標與主觀指標兩種。

一般而言，生活品質的衡量常被區分為兩個面向：客觀(objective)與「主觀」(subjective)兩種測量方法。「客觀」面向是一種運用量化的社會、經濟和健康等指標，以反映人們需求滿足的程度，其使用的指標如識字率、工作、住宅、所得、健康、醫療人事、綠地、犯罪率以及一些無須經由個人主觀評量的指標(Schneider, 1975; Ackerman & Paolucci, 1983; Costanza et al., 2007:268)。早期官方所建構的社會指標，常以客觀生活環境條件為基礎，這種社會指標常被視為即是一個國家或地方的生活品質，並以這些指標作為比較社區生活品質的依據，如聯合國的人群發展指標(the U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ID)即被視為是一種客觀生活品質的測量工具。

然而，若由「客觀」的指標衡量生活品質，其前提假設是：如果客觀條件變好，人們的心理感覺會因而轉佳。依據上述邏輯，客觀的生活條件將與主觀的生活滿意朝向同一方向變動，亦即兩者相互之間存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儘管相關研究發現客觀與主觀測量是有關聯性的(Masserman & Chua, 1980; Walter-Busch, 1983; Marans, 2003)，但並非所有的研究皆全然支持這樣的論述(Schneider, 1975; Campbell et al., 1976; Zhu, 2001)。例如，Schneider (1975)的研究即發現，客觀指標所測出之最富有的城市，並不必然是那些主觀上對其生活情境最感滿意的城市；反之，客觀上最差的城市，也並不必然是那些主觀生活滿意度最差的城市。因此，客觀的社會指標不能夠被直接採用作為個人實際經驗的福利或生活品質。

當「客觀」指標被認為過度偏重在客觀環境的層面，忽略了個體主觀的感受，再加上客觀的環境指標與民眾生活品質感受之間不見得有直接的相關性，因而，「客觀」的指標被質疑為無法反映出人們生活的真正態度，故有學者認為：品質必須是主觀的，衡量「生活品質」最正確的做法，即是直接詢問民眾個人的生活主觀感受(Schneider, 1975; 孫明為, 1997)。因此，強調民眾主觀感受的生活品質之觀點因應而生，也引發心理學家對生活品質相關議題的研究。此外，人們對於生活品質的觀點，亦隨著時間與外在環境而改變，因此對於生活品質的評估方式亦須隨之調整，對於生活品質注重的層面，不能再僅侷限於客觀的生活條件提供，尚須包括主觀的心理感受等方面的評量(Schneider,

1975; Zhu, 2001; 引自李永展、吳孟芳, 2005: 394)。

儘管生活品質有「主觀」或「客觀」的不同意涵，但已有許多研究者普遍認同生活品質是一種複合的觀念，它是許多不同層面的組合體。在社區的脈絡裡，Zautra et al. (1977:95)指出，社區生活品質的概念架構包括三項因素：幸福感(happiness)、社區參與型態(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tyles)及價值偏好(value preferences)。Shafer et al. (2000)從人文生態學(human ecology)的觀點認為，一個永續的社區要能為其所有居民提供並維繫一種優質的生活(a good quality of life)，該模式認為社區生活品質是由社區(社會)、經濟與(物理)環境等三領域的品質之持續性的互動所創造出。人們的社區(community of people)透過其成員的交往和參與社區生活呈現其社會支持網絡；社區物理環境應該要能夠以一種支持幸福，以及提供一種健康可居住的環境的方式存在；社區必須是要公平的，即其成員必須是要能獲得公平正義的對待，其基本的需求必須要能獲得滿足，且要能有公平的經濟機會。該模式進一步認為，可居住性、永續性、公平性及生活品質是社區、經濟與環境三者之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可居住性是環境與社區領域之交互作用的結果，永續性是環境與經濟領域交互作用的結果，公平性則是社區與經濟交互作用的結果，而三項領域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即是生活品質(如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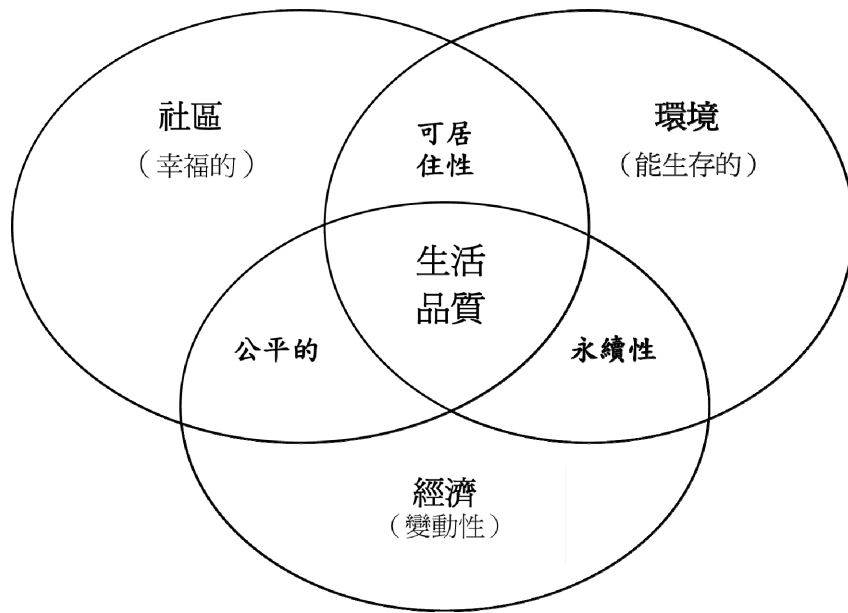


圖 1：生態觀點之有益社區社會品質的要素之概念模式

資料來源：Shafer et al., 2000:166

基於前述的分析，我們或可將社區生活品質定義為：一個地方社區的居民，對於其所居住社區之經濟、社會、環境、生態、文化、健康、安全及（甚至是）政治各層面的感受，其所形成的感受將影響到個人的滿意度、幸福感與福祉。然而，各層面所呈現出的狀況，除可能有具體的數量，也有的是社區居民個人的心理感受。黃源協（2011）即以臺灣的社區為研究範疇，發展出一分包含主觀與客觀的社區生活品質量表，主觀量表包括三個次面向：社區參與、社區規範及社區環境，客觀量表包括四個次面向：公共參與、人文教育、經濟發展與生活環境；主觀的係著重於感知層次，客觀的則著重於社區事實層次。

伍、臺灣社區發展的檢視

1990 年代中期可說是臺灣社區工作的轉折期，主要係從傳統社區發展為主的社區工作，轉向多元面貌的社區工作，這種轉折豐富了臺灣社區工作的內涵，也試圖展現臺灣社區的生命力與主體性。顯然，90 年代中期前的臺灣社區發展，已關注到多面向的發展，早期對基礎工程、生產福利與精神倫理等建設的勾勒，即是對民生、經濟、社會與人文層面的關懷。然而，「重硬體、輕軟體」、「重物質、輕文化」、「由上而下」及「地緣社區」的運作模式，使得社區運作的現象與結果，並沒有辦法如理論層次所期待的。儘管有形的社區外觀有所改善，但無形的精神倫理建設卻相對疏忽，這使得許多社區價值

在這個階段中是受到相當程度的妥協，如社會正義、公平、參與及學習等。此外，地緣社區造成的社區與村里之矛盾，對於社區凝聚力與社區能力的累積，迄今仍存在著負面的影響，特別是社區社會資本的損耗。

相較於 1990 年代中期以前的社區工作，「社區發展」不再是臺灣社區工作的唯一代名詞，福利社區化與社區營造計畫的雙雙啟動與發展，其政策的精神已更加重視建構「永續社區」之基礎的建立，福利社區化之對於弱勢族群的關注，及其所擬訂的策略或方法，已將社會正義、參與、公平與合作等社區價值納入其中；社區營造的推動，特別是「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的內容，更是兼顧到參與、學習、合作與環境正義的價值，以及社區能力與社會資本的創造；「六星計畫」之全面性的發展，更是一種兼顧「永續社區發展」之經濟、社會、人群及自然環境等全面性發展的政策取向。然而，我們卻仍發現，諸如社區產業、文化產業似乎才是政府真正的政策重心所在，也是許多社區真正的新寵。固然，以「產業」為核心的社區發展固然有利於社區的經濟，也可為社區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可是我們要問的是少數營造成功的明星社區，多數居民真的因此而受益嗎？或是產業反而影響到多數居民原本寧靜的生活？抑或是生態環境反而蒙受另類的負荷？

陸、結論與建議 – 營造有感的幸福社區

全面性的社區發展是社區工作追求的目的

標，這些理念早已反映在相關的政策與方案，然而，在現實的環境中，理論、政策與實務卻難以完全一致。早期主張的基礎工程、生產福利與精神倫理建設，多少已勾勒出社區發展的面貌，然而，「重硬體、輕軟體」、「重物質、輕文化」卻是政策實踐後所產生之偏頗現象的寫照，若再加上「地緣社區」造成的派系糾葛，更割裂社區居民彼此之間的信任與凝聚。晚近的社區營造或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更是全面勾勒出社區發展的面貌，在政府部門、民間團體及社區的協力之下，確實也打造出一些明星或旗艦社區，儘管仍有少數社區偏重於社會公平正義的實踐，例如，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服務模式，但最受到政府與社區青睞的莫過於以社區產業為主的營造。

我們慶幸確實有些社區已營造出以產業為主的社區發展模式，然而，我們要提醒的是產業雖為社區帶來成長，但須進一步思索的是「成長」是否伴隨著「發展」；此外，對於一些目前熱衷於投入「社區產業」的社區，其所追求的是社區絕大多數居民的產業，抑或僅是少數人利益的產業，又在產業發展的同時，是否也將社區可能付出的代價納入考量。政府部門已將制定「國民幸福指標」納入政策議程，其所關注的即是要如何將臺灣從「成長」帶向真正的「發展」。社區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場域，若我們能將「社區生活品質」納為社區營造及社區發展上的重要考量要素，即是在為「國民幸福指數」的提升奠定穩固的基石。為此，我們的社區政策必須要做適度的調整，特別是要能夠與「國民幸福指標」做適度的連結。為營造一個有感

幸福社區，本文提出底下的建議供政府決策上的參考。

一、建構「永續」與「生活品質」合一的社區生活

「永續社區」是社區工作的終極目標，社區的永續需要經濟、社會、人文與自然的全面性發展，在各種有形的建設和方案陸續推出之際，社區除須結合不同部門的方案外，若缺乏主、客觀社區生活品質要素做為發展上的指南，勢將難以為「永續社區」奠定基礎。過去數十年的社區發展之「重硬體、輕軟體」，再加上近些年之「偏景觀，輕文化」的社區營造，雖可為社區創造出華麗的外觀，但卻也隨著政府經費補助的縮減或停頓，而隨處可見外觀凋零的社區景象，這不僅未能實現社區的「發展」，甚至社區的「成長」亦隨之褪色。

過去數十年臺灣社區工作的發展，未能穩健地達到政策的理想或期待，其原因之一在於過程中忽略對「社區生活品質」實質意義的瞭解與關注。當我們在倡導社區發展或社區營造時，若能夠表持著永續社區之經濟、生態環境及社會之均衡發展的原則，並致力於將主觀與客觀生活品質的要素融入社區發展之中，朝向「永續」與「生活品質」結合而成的「社區生活品質」發展，將可讓我們的社區逐漸地從「成長」邁向「發展」，並營造出優質且有感的社區生活。

二、拔擢「社區生活品質」的標竿社區

有感的幸福社區絕非經濟成長可獨力獲致，它需要包括經濟、環境、教育、社區關

係與凝聚等全面性的發展。一份本土的社區生活品質量表已完成建構（黃源協，2011），這分量表包括主觀與客觀兩個面向，主觀生活品質（共計 27 題）係由社區參與（8 題）、社區關係（7 題）及社區環境（12 題）等三個次面向所構成；客觀生活品質（44 題）包括公共參與（9 題）、人文教育（7 題）、經濟發展（12 題）與生活環境（16 題）等四個面向所構成。社區生活品質的提升絕非一時可達成，它需要許多面向的配合。許多社區對社區發展的前景充滿著期待，但卻也瀰漫著迷惘，缺乏適切的指引方向可能是其原因之一。為將社區發展從著重「成長」導向真正的「發展」，建議社區主管單位在未來的政策規劃，能運用社區生活品質量表，拔擢社區生活品質的標竿社區，標竿社區可以是單一面向的標竿，也可以是全面的標竿。經拔擢的社區可做為其它追求提升社區生活品質的社區之學習標竿，藉此逐步地將社區導引至全面性的發展。

三、塑造「社區生活品質」與「國民幸福指標」的連結

馬總統已指示相關部門研發「國民幸福指標」，該指標可能是以全體國民為對象。社區是生活的基層/基本單位之一，若社區無法提供居民一個有感的幸福生活，未來所衡量出的整體國民幸福度，可能因未能兼顧到地區發展的失衡，而成為僅僅是一種表面的幸福圖像。為能夠讓國民幸福指數反應的是一個符合公平正義，且兼顧到地區或社區真實生活的面貌，未來國民幸福指標的建立必須要能夠考量到各個社區的真實生活。為此，

無論是「社區生活品質」指標的再建構，抑或是「國民幸福指標」的建構，必須要能將兩者之間產生一定程度的連結，以使得「國民幸福指數」反應的是絕大多數社區真正的「社區生活品質」。(本文作者：黃源協為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莊俐昕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候選人)

關鍵字：國民幸福指標、永續社區發展、社區生活品質

📖 參考文獻

- 李永展、吳孟芳 (2005)。〈臺北市主觀生活品質之衡量〉，《都市與計畫》，32 (4)：387-420。
- 孫明為 (1997)。《以公共設施滿意度與社會網絡強度評估社區生活品質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碩士論文。
- 黃源協 (2011)。《成長或發展？社區能力與社區生活品質之研究》，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NSC98-2410-H-260-046-SS2)。
- Ackerman, N. & Paolucci, B. (1983).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Income Adequacy: Their Relationship to Perceived Life Quality Measur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1):25-48.
- Aki, H. et al. (2008).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Levels of Life Skills, and Their Clinical Determinants in Out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Psychiatry Research*, 158:19-25.
- Bonaiuto, M., Fornara, F. & Bonnes, M. (2003). "Indexes of Perceive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in Urban Environments: A Confirmation Study on The City of Rom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65:41-52.
- Bourdieu, P. (1997).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A. H. Halsey, H. Lauder, P. Brown & A. Stuart Wells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mpbell, A., Converse, P. & Rodger, W. (1976).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Perceptions, Evaluations and Satisfacti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Costanza R., et al. (2007). "Quality of Life: An Approach Integrating Opportunities, Human Need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logical Economics*, 61:267-276.
- Gamble, D. N. & Hoff, M. D. (2005).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M. Weil (ed.). *The Handbook of community Practice*, 169-188. London: SAGE.
- Gilchrist, A. (2004). *The Well-Connected Community – A Networking Approach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Bristol: Polity Press.
- Green, G. P. & Haines, A. (2008). *Asset Building & Community Development*. London: SAGE.
- Hamstead, M. P. & Quinn, M. S. (2005).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heoretical Convergenc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Local Environment*,

- 10(2):141-158.
- Home Office (2004). *Firm Foundations: The Government's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London: Civil Renewal Unit, Home Office.
- Kavanaugh, A. L., Reese, D. D., Carroll, J. M. & Rosson, M. B. (2005). "Weak Ties in Networked Communitie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1:119-113.
- Kay, A. (2006). "Social Capital, The Social Econom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1(2):160-173.
- Marans, R.W. (2003).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rough Quality of Life Studies: The 2001 DAS and Its Us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65:73-83.
- Masserman, I. M. & Chua, L. A. (1980).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Indicators of Quality of Life in American SMSA's: A Reanalysi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3):365-381.
- Mel, E. & Jenny, O. (2007). "Social Capi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 A Community Under Threat". *Local Environment*, 12(1):17-30.
-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s (2000). *Prove It! :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Neighbourhood Renewal on Local People*. London: Groundwork, NEF.
- Peat, K. (2007). "The Ideal of A Sustainable Community". In C. J. Clay, M. Madden & L. Potts (eds.), *Towards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People and Place*, 97-11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Putnam, R. (1993).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
- Rubin, H. J. & Rubin, I. S. (2008). *Community Organizing and Development* (4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 Schneider, M. (1975). "The 'Quality of Life' in Large American Cities: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4):495-509.
- Seik, F. T. (2000).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Urban Quality of Life in Singapore (1997-1998)". *Habitat International*, 24:163-178.
- Shafer, C. S., Lee, B. K. & Turner, S. (2000). "A Tale of Three Greenway Trails: User Perceptions Related to Quality of Lif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49:163-178.
- Walter-Busch, E. (1983).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of Regional Quality of life in Switzerland".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4):337-391.
- WECD(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olcock, M. (2001). "The Place of Social Capital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2(1):11-17.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HOQLQ: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ctober 1999 vision), Geneva: WHO.
- Zautra, A., Beier, E. & Cappel, L. (1977). "The Dimensions of Life Quality in a Comm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5(1):85-97.
- Zhu, J. (2001). "Multidimensional Quality-of-life Measure with An Application to Fortune's Best Cities".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35:263-284.